

哲学家

毛泽东

杨春贵 李火林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哲 学 家 毛 泽 东

杨春贵 李火林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吉勇夫
封面设计	臧 洪
版式设计	任志珍
责任校对	苏彰秦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早年的哲学追求	(5)
第一节 从理想的追求到哲学的追求	(5)
第二节 早年哲学探索的思维轨迹和行程	(27)
第三节 早年的哲学探索和青年毛泽东的主体 建构	(47)
第二章 调查研究的楷模	(56)
第一节 读“无字之书”	(56)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践履	(60)
第三节 对调查研究的哲学反思	(71)
第三章 密纳发的猫头鹰起飞了 ——中国民主革命经验的系统哲学总结	(79)
第一节 理论思维能力的再锤炼	(80)
第二节 政治斗争的哲学总结	(87)
第三节 军事斗争的哲学总结	(90)
第四节 “两论”——中国民主革命经验的系 统哲学总结	(98)
第五节 对主观主义的系统批判和对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精辟阐述	(123)
第四章 架起哲学通向实践的桥梁	(136)
第一节 作为战争游泳术的军事辩证法	(137)
第二节 奇谋睿智的政策和策略辩证法	(150)
第三节 深蕴唯物辩证思想的工作方法和领导 方法	(161)

第五章 让哲学走向大众	2-F96/64
——普及哲学的伟大倡导者.....	(176)
第一节 延安时期致力于哲学解放的伟大实践.....	(177)
第二节 建国后普及哲学的新篇章.....	(189)
第六章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哲学沉思	(208)
第一节 思考的历程.....	(208)
第二节 哲学沉思的积极成果.....	(221)
第三节 思维的误区.....	(233)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初步哲学总结及其局限	(253)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哲学升华.....	(253)
第二节 思维的盲点及其主体根源.....	(273)
第八章 新探索、新视角、新境界	(303)
第一节 哲学的追求垂老而不倦.....	(304)
第二节 哲学家的交往与哲学问题的探讨.....	(311)
第三节 意境玄高的哲人.....	(325)

前 言

在《哲学研究》1991年第2期，我们发表了《善于从哲学上提出和解决问题——毛泽东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个显著特点》一文。后来，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认为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研究毛泽东的新视角，不仅对于专业哲学工作者，而且对于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如何学习哲学、研究哲学、运用哲学和发展哲学，都有一定的启发和教益。受到这种鼓励，我们又就这个题目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哲学家毛泽东》，就是以那篇文章为基础，以那篇文章的基本框架为线索，补充资料，展开论述而写成的。

毛泽东是一位集哲学家与革命家品格于一身的伟大历史人物。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青年时期，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深感哲学之重要，认为改造哲学是改造中国之本：“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据此，他认为，哲学是人生立志之本：“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决心“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哲学著作。当然，不论“国学”还是“西学”，对于中国来说都不是什么济世良方，最终都不能成为毛泽东实现其救国救民理想的哲学基础。但这并不意味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86页。

着毛泽东早年的这种哲学探讨是毫无意义的。它不仅使毛泽东受到哲学的熏陶，经受了严格的哲学训练，锤炼了较高的哲学思维能力，而且正是通过对各种哲学思想是非曲直的比较，最后一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便矢志不移，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①在筹备建党的过程中，他十分明确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②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之后，他便自觉地以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分析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尤其是到了延安之后，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他深入、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下了大量的哲学笔记，《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绝大部分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下的。他在一本书的批注中写道：“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③这本“批注集”和《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为我们从哲学高度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光辉的范例。把历史经验上升为哲学理论，是为了指导新的实践。毛泽东又为我们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光辉的范例。他的许多军事著作、政治著作、经济著作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充满哲学的智慧。由于有了这种哲学的智慧，使他在研究、分析问题的时候，总是比别人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深一些、更远一些，总是有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势，使人产生顿开茅塞、耳目一新之感。在建国以后，一直到他的晚年，研究哲学的兴趣，始终没有衰减。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仍然需要发展，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③《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312页。

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①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是他研究的重点，同时也着力探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哲学问题，尽管他在晚年犯了错误，但是，他的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他的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破除僵化的社会主义观念方面仍然起了巨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他的关于“基本粒子并不基本”的科学论断不仅在哲学界、而且在自然科学界都产生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他在总结实际工作经验教训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至今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带头钻研哲学、运用哲学，而且大力号召和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哲学、运用哲学，是普及哲学的伟大倡导者。正是在他的倡导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认识工具，“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在中国，哲学的群众化，不论就广度和深度来说，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这是毛泽东哲学活动的一个伟大成果。

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专著，可以说汗牛充栋。本书的特点在于，不但重视毛泽东哲学思想内容的阐述，而且力求叙述毛泽东研究哲学的活动，揭示其思想酝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不但重视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的探讨，而且重视这些理论又如何地被运用于实践之中；不但重视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而且注意到毛泽东个人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包括他早期哲学探索的历程和意义，以及晚年他的哲学思想的变化和得失；不但重视毛泽东本人的哲学活动，而且说明了他又是如何指导广大干部、群众从事哲学活动的。总之，本书力求全方位地揭示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如何重视研究哲学、运用哲学和发展哲学的，是如何善于从哲学的高度总结经验，研究实际情

^①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5—36页。

况，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是如何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出和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问题的。我们认为，重视从哲学上解决问题是毛泽东成功的重要秘密之一，也是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的精神财富之一。我们愿意以这一份不成熟的探索成果贡献于广大读者，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一个纪念。

作 者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于北京

第一章 早年的哲学追求

毛泽东从小就志存高远,立志救国救民。正是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现实道路的过程中,他开始了早年的哲学探索活动。在其不懈的探索过程和思想演进过程中,他受过古今中外许多思想流派的影响。他不断地接触、不断地选择、不断地吸收、又不断地抛弃各派哲学,直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从而义无反顾地与自己从前的信仰决裂,实现了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这就是毛泽东早年哲学探索活动的基本思维行程和走向。早年的哲学探索活动既使毛泽东的救国救民理想逐渐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空想走向科学和现实,同时又促使毛泽东独特的主体世界得以建构,所以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可以说,早年的哲学探索是哲学家毛泽东的诞生地和摇篮,是毛泽东能够成就为哲学王的秘密所在之一。

第一节 从理想的追求到哲学的追求

毛泽东作为世纪之交孕育产生的、历史巨变时代的哲人,他的哲学活动不能不说同他自己对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所要完成的社会任务的理性自觉和勇敢承担紧密相联,不能不说同他对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的自觉追求直接相关。大家知道,人生理想是人们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体系,它反映着主体对现实的否定性态度,凸现了主体超越现存的冲动,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处于灵魂和支配地位。对理想的信念和信心,能够激发人们的意志、情感和激情,成为人们追求真理、追求价值对象的强大精神动力。马克思曾说:“激情、

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①列宁也曾强调：“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②可以说，正是青年毛泽东的远大志向和崇高理想的强大驱动力量促使他上下求索哲学道理，促使他积极从事艰苦的哲学探索活动的。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远大志向是毛泽东早年哲学追求的动力因和目的因，由此也决定了他一生研究哲学的风格 and 特点。

毛泽东诞生于世纪之交的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毛泽东诞生的时候，中国正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众所周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纷至沓来；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媚敌卖国，因而一次次侵华战争相继爆发，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一批批黄金白银，就象流水似地滴入帝国主义的腰包。封建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鱼肉人民，敲骨吸髓。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可以说，毛泽东出生的时代正是中国倍受列强欺侮的时代，是国破山河碎的时代，是内忧外患交困的时代，是中国人民受尽屈辱的时代，同时，也是新与旧、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动两种势力正在东方大地上剧烈搏斗的时代，也是孕育仁人志士的时代。早年毛泽东就生活这样的国度、这样的时代。虽然在17岁以前他生活在表面上似乎恬静的也显得闭塞的小山村——韶山冲，未能同外部的世界构成广泛的信息沟通和联系，但，韶山这一小山村也并不是被社会苦难所遗忘的人间仙境桃花源，也不是一块没有社会纷争的净土，这里同样充满了凄风苦雨。“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这饱蘸着血和泪的民谣正是韶山人民苦难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

②《列宁全集》第20卷第255页。

活的真实写照。因此，生活在韶山冲的毛泽东同样感受到中国民众的苦难，同样能够倾听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苦难的悲叹和呻吟。毛泽东的社会责任感和救国救民的理想就萌发于他少年时代在韶山冲的观察、体验和所受的启蒙教育。而这一切首先是借助于他所生存的家庭环境这一中介环节而发生的。

人首先是经过家庭这一环节而与社会构成交往关系从而开始社会化过程的。“严父慈母”型的农民家庭环境对毛泽东早年的社会化及其人格和理想的塑造和建构产生着重要影响。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毛泽东对人世间的爱与恨开始有了体验，而这种体验的整合则促使他萌发了拯救民众的愿望和冲动。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位治家很严，一心想发家致富的农民。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回忆道：

“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①

毛泽东对其父亲的严厉、苛刻和暴躁的秉性以及唯我独尊的家长制作风是十分愤恨和不满的。他看不惯父亲那为所欲为、盛气凌人的架势，因此他与父亲经常发生冲突并展开了多次斗争。他曾回忆道：

“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我还说：等我到他这样的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②

①②《毛泽东自述》第6、7页。

“在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迫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①。这才迫使父亲屈尊让步。

这次“反抗”与“胜利”，使毛泽东意识到了“反压迫”的意义。“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②。

如果说毛泽东从父亲身上从反面懂得了“反抗”的意义的话，那么毛泽东从母亲身上则从正面学到了爱弱者的博爱精神。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③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尔亲疏，一皆覆载。恺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辟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病时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④

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博爱纯朴的风范，胜于写在经书上的教条，对少年毛泽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母亲的影响下，毛泽东较自觉地怜悯弱者，常能设身处地理解穷人。“普渡众生”、行善积德的佛家平等、博爱意识在他的观念中留下深深的印迹，并使他身体力行地经常帮助贫苦农民做些事情。例如1904年，毛泽东在关公桥私塾就读时，自带中餐。一天，他见一个同学没有带

①②③《毛泽东自述》第8、6页。

④《祭母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10页。

饭，当了解到他家贫穷，只有杂粮吃时，便与他分吃饭菜。回家后，母亲见儿子比平日吃得多，以为饭带少了，儿子把原委告诉母亲，母亲很赞许，从此每天给儿子多带些饭菜。有年秋收季节，有天下午暴雨即将来临，当他正要抢收自己谷子时发现邻居晒谷场上只有一个妇女在抢收，就立刻赶去帮忙。结果他自家的谷子遭雨淋，他也挨了父亲的骂。有一次，他父亲买了人家一头猪，已按时价交了定钱。过了些日子，父亲要他去赶猪。当他获知猪价上涨，按原价成交卖方要损失好几块钱，而损失这几块钱对于贫穷的卖者是个大缺空时，便主动地退掉了这桩买卖。有个叫毛承文的农民敢于与地主豪绅对抗，结果被扣上破坏族规的罪名，押进祠堂，准备毒打、沉潭。毛泽东闻讯后和贫苦农民一起冲进祠堂和族长进行说理斗争，迫使族长释放了毛承文。但毛泽东母子的博爱行为却经常遭到毛顺生竭力反对。毛顺生不赞成施舍。有一年，毛顺生的堂弟毛菊生因家境贫困不得不出卖七亩田，毛顺生想买进，毛泽东母子不同意，竭力劝说毛顺生不要买，而应该帮助菊生度过难关，并瞒着毛顺生给菊生家送去食物。但毛顺生却坚持要买菊生的田，嚷道：“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这件事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解放后，他多次同堂弟毛泽连谈及。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如果说“父严母慈”的家庭环境使毛泽东开始萌发了反抗压迫、拯救弱者的模糊意识的话，那么私塾的启蒙教育，广泛的阅读和接触外界事物则使他逐步产生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毛泽东自幼的身份是小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小学生。作田与读书，他更好读书，前后六年私塾，四书、《左传》等能背诵如流。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中说：“我过去读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应该说儒家思想对少年毛泽东是产生过潜移默化的作用的。但尽管如此，他对于描写造反故事的传奇小说的兴趣远胜过“四书五经”，因此造反故事对于少年毛泽东的影响也可能更大。正如他自己在1936年所回忆的：

“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①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②

可以说，这些书不仅使毛泽东对造反的意义有了进一步认识，而且也使他进一步感觉到了压抑着的农民，不自觉地寻找着农民的历史足迹，并促使他开始形成拯救贫苦农民大众的价值取向。而长沙饥民抢米事件，韶山哥老会与地主暴力的冲突，韶山当地农民因困于粮荒而发起的“吃大户”运动等等则进一步充实和验证了他在读小说时所发现的必然事实。他在回忆中明确承认：“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③“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

①《毛泽东自述》第8—9页。

②③《毛泽东自述》第10、11页。

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①又说：“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它们的冤屈，我深感不平。”^②他赞美不甘屈服的造反精神，但又对屡次失败“深感不平”，于是，他开始萌发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感。

如果说关于造反的故事和韶山等地的农民造反事件促使毛泽东开始产生救民的意识的话，那么，他阅读了《盛世危言》和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则开始萌生救国的忧患意识。

《盛世危言》是毛泽东在韶山文云昌借来的，是他13岁至15岁辍学在家时所学习的。这本书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开明”的改良主张。尽管作者的改良主张，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早已宣告破产。但是，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无疑具有顿开茅塞、耳目一新的感觉和意义。于是，他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途，而作者的教育救国思想则激发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③

唤起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书，除了《盛世危言》外，还有一本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中国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这本书对他影响太深了，直到1936年他同斯诺谈话时“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

①②③《毛泽东自述》第13、12、11页。

矣！’”还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①开始意识到救国救民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

《盛世危言》和《列强瓜分之危险》激起了少年毛泽东恢复学业的愿望，也使他产生了学习“新学”的愿望。因此，他坚决拒绝父亲为他设计好的人生道路——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而选择了自己认可的“独木小桥”。在亲友的帮助下，他终于离家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这可说是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个转折。1910年秋，17岁的他，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小山村，来到了当年的一个新式学堂。临离家时，他专门抄录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政治家西乡隆盛的一首小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东山高等小学虽然他只读了半年，但初步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他回忆说：“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②在此期间，他还给自己取名“子任”，以示救国救民的决心。在东山小学他还学到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和新的西方科学知识，“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还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德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③他们都成为他推崇的对象。东山小学的学习虽然为毛泽东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启

^{①②③}《毛泽东自述》第13、15、16页。